



追寻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与鲁迅

秋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追寻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与鲁迅

秋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秋石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 - 7 - 208 - 09850 - 3

I. ①追… II. ①秋… III. ①毛泽东(1893 ~ 1976)—
人物研究②鲁迅(1881 ~ 1936)—人物研究 IV.
①A755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2476 号

责任编辑 许仲毅
封面设计 傅惟本

追寻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与鲁迅

秋石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5.75 插页 6 字数 286,000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3,250

ISBN 978 - 7 - 208 - 09850 - 3/A · 84

定价 32.00 元



1928年3月16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



1930年，由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拍摄的鲁迅像



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

1936年10月8日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座谈



1936年10月8日，参观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时的鲁迅



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合影。在座谈会上，毛泽东先后十多次提到鲁迅

鲁迅先生之墓

1956年毛泽东题写的“鲁迅先生之墓”手迹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左) 毛泽东手书鲁迅诗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浩气长存
鲁迅先生
毛泽东
1961年10月7日

(右) 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赠送日本外宾的手书鲁迅《无题》诗

萧军同志：
两友来示都无佳音，
已往上海，我同你同往，
接解，缺了碗，有些问题，
同你同往，又补美来，
拍你，反引起你，
你说，这年有技术，
你对代们，都能得法，

同你
改正。在代，
心向某些毛病，不要总是对，
问题，要有耐心，
人民党信，要故，
病有心的，
安心工作，
苦甚也。何是在此，
故，

给挂解如上。如得同，
同你再谈一回。同
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十

在延安，毛泽东先后两次登门探望萧军，十次函致萧军。此为毛泽东1941年8月致萧军信手迹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中国才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僵死的。瞿秋白同志是有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肯思想的。他的遗著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
十一月二十日

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所作序言手迹

海上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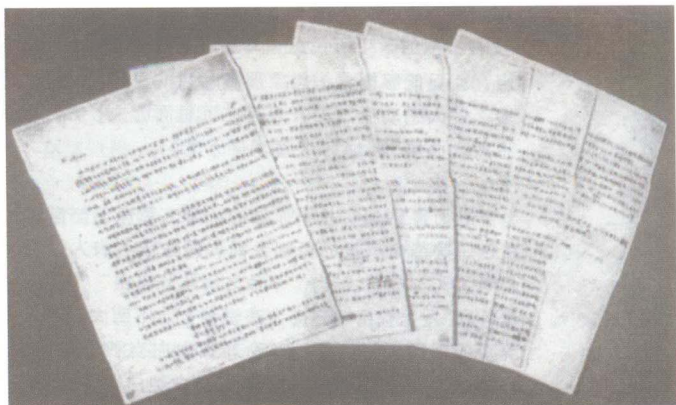
上卷出版

本卷所收，都是文藝論文，作者既係大家，譯者又是名手，信而
 且達，並世並兩。其中，高亨之義文手論，高爾基論文述
 集^{兩種}，尤為煌煌巨製，此外論說，亦不一而足，是以益解，是以
 傳世。全書六百七十餘頁，以活板插畫九幅。僅印五百部，
 內一百成脊麻布面，全項，每本定價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紙面，
 定價二元五角。出銷部卷二角三分。^{佳書昂貴，欲購從速。}下卷^{亦已付印}定于本
 年出版。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代售。

鲁迅为推介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亲撰的广告语

疑公遺兒屬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在當以同懷視之
 洛文錄何瓦琴白

鲁迅1933年赠瞿秋白录何瓦琴句



瞿秋白与鲁迅探讨有关中国文学史问题的信件手迹

雲臺無計迴神矢
風雨如磐周故園
寄意寒星空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

寫此時辛未二月六日也 魯迅

鲁迅手书：自题小像 1931年

慣于長夜過春時
挈婦將雛鬢
有絲夢裏依稀
慈母淚城頭
空紅大瓦旗
忍看朋輩成
新鬼怒
向刀邊
覓小詩
吟罷紙扇
空寫
幾月
光如水
照縑衣

中年春作錄之

李市兄教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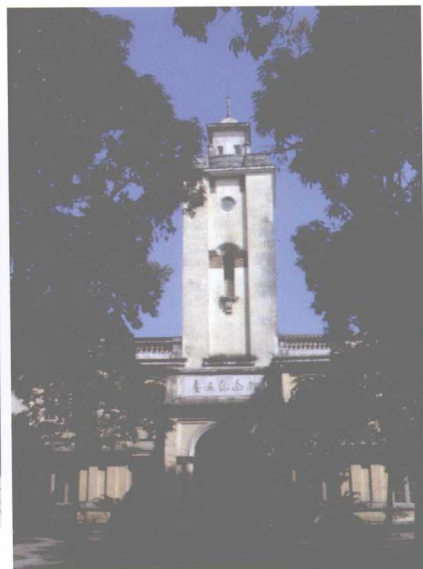
魯迅



鲁迅手书：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1931年



北京鲁迅博物馆



广州鲁迅纪念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



厦门鲁迅纪念馆



绍兴鲁迅纪念馆



南京鲁迅纪念馆

萧军先生：

给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洁的来信我很熟，但好像没有见过她，因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说在文坛不见她的名字，不知道那里去了？

未读的两个月问题的答覆——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想做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一篇争的文章，如果你去写一篇争的文章，那末，无论他争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争好的。就是写什么争什么，争什么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来领导他译稿。

丁君，上海北四川路底，由山基衣制，图像才收，我以是掛送，以是送也。

我的那一带野州，技术虽不厚，但心作在认真了，因为那一带野州，许多打之之徒，送来的，我希望你能够这种认真心的彩信。

鲁迅先生 叩

晴

十月九夜

鲁迅给萧军和萧红的第一封信——1934年“十月九夜”，在十四个月的时间里，鲁迅先后给二萧五十三封信，充分表达了他对这两位来自沦陷区的热血青年的关爱

陕北红军根据地
保卫人物一时新
冲破周安会
招待出家人
组织一技讲占似
三气张桓侯
陈国同向陇山东
作元元小姐
今日武将军

1936年丁玲抵达陕北红军根据地，毛泽东赋诗赠丁玲。此为毛泽东赠丁玲诗手迹



深受鲁迅和毛泽东关爱的作家丁玲

目 录

上篇 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

一、“亲聆者”还有多人在世	002
二、1957年7月7日晚:历史现场相与析	007
三、毛泽东和蔼可亲:黄宗英等亲历者说	032
四、1957年:赵丹先生属于左派阵营	039
五、关于“毛、罗对话”等情况的通报	047
六、与黄宗英商榷:此遗言,非彼遗言	050
附录1 参加1957年7月7日座谈的33位人士简介	054
附录2 为历史瞬间留影的徐大刚先生	063

下篇 毛泽东与鲁迅

一、“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066
二、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架起桥梁	076
三、诗心相通	084
四、与鲁迅书长相随	097
五、对“阿Q”的独特理解	107
六、“圣人”和他的学生们	121
七、爱屋及乌扬鲁迅	185
后记:有关历史的真实、勇气及其他	228

上篇 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中，真的说过如果鲁迅还活着，可能会把他关入大牢的话了吗？

长期工作在基层，业余从事左翼文学左翼作家研究的笔者，六年来40余次自费前往上海寻访考查，先后发现除黄宗英这位自诩为可能是唯一在世的“亲聆者”外，还有八名存世的参加过那次谈话的现场亲历者……

那么，就鲁迅这个话题，毛泽东究竟说了些什么呢？这个话题，在1957年毛泽东又论说了几回呢？是否只有罗稷南先生一个人提出过这个话题呢？为什么出席同一个座谈会的36位各界人士，包括那个令黄宗英“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提出惊天话题的翻译家罗稷南在内，竟然无一人成为右派？还有，在1957年间，被黄宗英时隔45年后反复渲染的所谓陷身于重重“风雨飘摇中”的赵丹先生，究竟是所谓右派？抑或是边缘地带的中右？还是立场坚定揭发了他人右派言行从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左派？

一、“亲聆者”还有多人在世

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看到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C22版

002

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你就更应该是把这件事写出来，留下来。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涉及中国现代史的一段重要史实，你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把你所看到、听到的如实写出来，留待专家和后人去研究。”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①

摘自2002年12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5版

上述，是作为“现场见证人”的黄宗英和“我熟悉的律师”之间的一段对话内容。这段对话内容十分精彩，其精彩之处在于他们将中国人固守了几千年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法则，给硬生生的掰成了两截：法庭上，和法庭外。

笔者之所以将分别刊于《南方周末》和《文汇读书周报》上的这段对话内容，不厌其烦地一一重复列出，盖因其同一内容，但表述却有所不同。刊在《南方周末》上的，律师

^① 为方便叙述起见，以下将《我亲聆毛泽东及罗稷南对话》一文简称为《亲聆》。

强调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而仅仅相隔了一天——2002年12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所刊的，则又变成了“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你就更应该把这件事写出来，留下来。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涉及中国现代史的一段重要史实，你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把你所看到、听到的如实写出来，留待专家和后人去研究。”

黄宗英将这段对话内容均加注了“引号”，既然加注了引号，足以表明了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及可靠性，而且是不可随意加以删改或作不同表述的，除非你声明前文表达不全或有误。然而，早在1965年就成了上海市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的黄宗英却不加任何说明地作了改动。这让读者读后，不免对她的文中内容的真实程度产生了怀疑。如同她在2002年的某一个时候，先是一脸郑重地告诉《南方周末》的取稿记者：你们《南方周末》影响大，敢讲真话，“由你们首发！”过不了几天，又对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编辑信誓旦旦地说：我授权“由你们和《炎黄春秋》同步首发——”；^①同时黄宗英还用龙飞凤舞的笔体（含签名）书写了本文题目，交给了《文汇读书周报》的取稿人员……

在黄宗英《亲聆》一文于“7月4日晚上写毕”之后，黄宗英电询“我熟悉的律师”。电话征询的结果是，如同5个月后她在《亲聆》一文中这样写道：

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而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黄宗英“求助”了哪些人呢？是不是与她一起在1957年7月7日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毛泽东亲切笑谈的36位各界人士中的某位成员呢，遗憾的是，黄宗英女士在其文章中并没有向我们举证出她向其他哪一位曾经出席过半个世纪后令她与当时并不在场而只是“听说”的鲁迅之子周海婴等人至今“心有余悸”的那次座谈会人的名字。

不过，有关黄宗英“求助”的人，黄宗英虽然没有在文中提及，但她还是向两位前来取稿的年轻人作了亲口叙述。在同一版面右侧的《听黄宗英说往事》一文中，方、齐二位取稿人向读者们作了这样的描述：

……

黄阿姨说，这篇文章能够拿出来，我给自己设了“五关”。……第五是文

^① 见2002年11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头版所发预告。

字关,7月4日晚上写毕,过了些日子我就把稿子交给了李普大哥(李普,新华社原副社长)。……我对李普大哥说:“拙文若有语病、啰嗦、不妥之处,请放手删改、调整。”

请读者们注意,黄宗英是将这篇“涉及中国现代史的一段重要史实”的文章全权授予李普先生“放手删改、调整”的。这就奇怪了,李普先生既非当年座谈会的出席者,亦非新华社采访这次座谈会的记者,他怎么可能因你黄宗英给予的“信任”,来充任对你的“亲聆”内容“放手删改、调整”这一重任呢?什么是妥,什么是不妥,李普先生根本无法定断,因为他并不是那次座谈会的当事者。如若李普先生真要是这样做的话,岂非是有删改、调整乃至造假历史的嫌疑了吗?

李普先生能给黄宗英女士把什么“关”?作为一个从事半个多世纪的新闻从业人员,他能把好这个他从来不曾莅临过的1957年7月7日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有毛泽东出席的座谈会的“关”吗?答案非常明确:不能!作为一名资深编辑,他至多只能就黄宗英文中的错字、别字和语法、逻辑等作些修改而已!至于“放手删改、调整”,李普先生是不具备这个资格的。

黄宗英还回应另一个人作了“印证”。这个人,黄宗英“亲聆”的文章中没有涉及,两位前来取稿的记者在《听黄宗英说往事》一文中同样没有涉及。个中缘由很简单,由于不是“亲聆”,那个人也是无法帮助她解决任何问题的。

这个人是黄宗英女士的浙江老乡。1957年7月7日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座谈会召开之时,这个人才十七岁,还在老家上中学。有意思的是,2006年5月9日,上海、浙江有关部门联合举行的鲁迅学生黄源百年诞辰纪念会的前一日,这个人向人们笑谈了四年前他与黄宗英之间所经历的这一幕。聆听者有多位,笔者恰恰有幸与其紧挨着坐在一起并坦诚对话。

黄宗英的上述作为令人费解,她为什么不找一同出席当年座谈会的人去核证,而去找两个当年并不在会场的人员进行“删改、调整”或“把关”呢?由此不得不让人起疑,她信誓旦旦的那个“亲聆”之说究竟是不是“铁证”。

那么,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当年参加座谈会的36位“各界人士”,除黄宗英之外,是否均已不在人世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搞清楚。单凭黄宗英在上海的名气和各方关系,要弄清楚这36位人士还有几位健在,并不需费太大的周折。可是黄宗英从撰写《亲聆》到公开发表以来的这么多年中,她从来不曾这么去做。这就更令笔者疑端丛生:这又究竟是因为什么?

据笔者多次向上海有关人士有关方面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被告知:黄宗英于2002

年12月发表此文时,参加1957年那次座谈会者尚有多人健在,而且神志并不糊涂。这就直接破除了她在《亲聆》一文中与律师对话时所云“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的这个判断。之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主观臆断,因为律师也好,黄宗英也好,既然能够花费大量时间“我就到处求助”,为什么不向其的居住地及工作单位所在地的上海的方方面面打听一下?

读了这段即时即景(在2002年7月4日“病中”动笔撰写《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同一时间)发生的对话,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向律师作这个咨询时,黄宗英为什么不先行认真地思索一番:这世上,除了“我”之外,参加那次谈话的还有哪一些人活着?在打听清楚的基础上,哪怕是打听出一两个健在者后,是否还应当向活着的这一两个人印证一下,然后,再考虑如何发表的问题。等等。再有,从“我熟悉的律师”口中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那句“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的话,显然是顺着黄宗英的话头而来。“正因为”这三个字十分关键,表明了黄宗英本人首先是这样认知的——她应该是现今世上唯一“历史现场”健在者,自然是唯一能够证实“毛罗对话”内容真实与否的人。

确实,在一段时间里,许多人是相信了她所说的话的。何况,还有由她一手翻检出来,一脸欣喜地拥坐在毛泽东身边的那幅照片为证。

可也正是这段对话的内容,令笔者读后不由得疑窦丛生:作为著名演员和作家,又是在向世人讲述如此一件惊天动地、惊吓得导致自己“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大事,怎么能够如此轻率地不作任何调查,向包括自己的好友、当年的同事在内的同一个历史现场见证人征询一字半句,就武断地认定其他“当时在场的人……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呢?

不光是在落笔撰写文章之初,而且,于文章写毕的五个月后,《南方周末》甫一刊出,事情就起了明显的变化。原因十分简单——从前一日《南方周末》文中“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的表述,变成了第二天《文汇报读书周报》文中去掉“大概”二字的“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的说法。显然,早在《亲聆》被《南方周末》记者拿去后的一段时间内,以及该文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当日当晚,就有人(而且不在少数,且主要在“毛罗对话”的原发地上海,反响尤为强烈)为这个“大概”的表述纠正上了:明确告知,1957年7月7日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与黄宗英一道出席同毛泽东座谈的人士中,还有多人健在!

一个令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六年多来笔者不懈地寻踪调查、考证的结果,却是板上钉钉地印证了六年前笔者头脑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这个疑惑:迄今——2009年3月,在已知的仍健在的多位当时在场的人中,就有黄宗英的两位前辈同事、好友在内!